

# 出世与入世的抉择<sup>①</sup>

## ——张其昀从政原因浅析

郑素燕<sup>1</sup>, 方良<sup>2</sup>

(1. 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2. 安庆一中, 安徽 安庆 246003)

**摘要:** 张其昀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学家。出世与入世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张其昀在1949年前, 试图调和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 兼任“政治人”与“文化人”的双重角色, 便在1939年加入国民党, 以学者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49年后, 张其昀受儒家思想意识的影响, 同时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选择了入世, 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 弃学从政, 进入台湾国民党政府。在政治领域, 张其昀仍承担着一名“文化人”的职责, 为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和各级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关键词:** 张其昀; 出世; 入世; 儒家思想意识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124-05

## Choice on Withdraw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or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Life

###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Zhang Qiyun's Political Career

ZHEN Suyan<sup>1</sup>, FANG Liang<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qing Normal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011;

2. Anqing First Middle School, Anqing, Anhui, 246003)

**Abstract:** Zhang Qiyun is a famous historic geography expert and educato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ether to withdraw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or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life is a difficult choice for all scholars during that time. Before 1949, Zhang Qiyun attempted to solve the conflict of “withdrawing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or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life” by playing double roles, that is, took part in the Party of Kuomintang in 1939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politics as a scholar. After 1949, Zhang Qiyun was affected by Confucian ideology,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gratitude for Jiang Jieshi for receiving his help, he chose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social life actively, and he accepted Jiang's invitation by working as a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in Taiwan. Then he gave up his research and devoted into politics. In political field, Zhang Qiyun still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cholar”, and h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publishing and educating area at all fields of Taiwan.

**Key words:** Zhang Qiyun; withdraw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life; Confucian ideology

张其昀(1901-1985年), 字晓峰, 浙江省鄞县人, 中国现代著名史地学家, 教育学家。在学术文化上, 张其昀一生笔耕不辍, 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

面硕果累累, 成就斐然, 并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为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教育上, 张其昀早年服务于南京中央大学和

① 收稿日期: 2010-11-22

**作者简介:** 郑素燕(1983-), 女, 安徽宣城人, 安庆师范学院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方良(1982-), 男, 安徽滁州人, 安庆一中教师, 主要从事文史研究。

浙江大学,并一手创办了浙大史地系;在台湾任教育部长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台湾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晚年还创办了华冈学院。与此同时,张其昀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49年后加入台湾国民政府,是学者从政的典型代表。

出世与入世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产生以后就面临的一个困惑,是出世还是入世?抑或调和两者的关系,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本文通过对张其昀从政原因的分析,来说明张其昀在面对这一困惑时,是怎样进行抉择的。

## —

出世与入世是张其昀等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与中国古代的士相比,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厉行科举制的古代,士子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进入政治中心,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他们没有自己能够独立于大一统政治以外的学术营地。当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在西方浪潮的拍打下,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具有近代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与大一统政治的人身决裂,赢得了以创造知识文化为职业标记的独立社会身份。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传统的士大夫才历史性地转化为近代的知识者。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嬗变。一个知识者自我价值之实现,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可以向内谋求于文化学术事业本身。”<sup>[1]</sup>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张其昀将他的安身立命之处放在了学术与教育上。

张其昀自小在父亲兆林公与中学老师陈康黼等人的影响下,决心以后从事学术和教育。在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时,张其昀入学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但体格检查却不合格,遭淘汰。当时柳诒徵是张其昀的主考老师,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当得知张其昀因体弱不得录取时,便去求情于学校。由于柳诒徵的力荐,张其昀才特准进入南高师。对恩师的感激,使他立志要办一所大学,来培育青年学生。因此,张其昀一生都致力于学术教育,尤其是在1949年前,张其昀一直服务于大学,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在这一时期,张其昀不管是在教育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成绩斐然。

然而,“正当中国的知识者这‘学术自我’的一重机能被唤醒的同时,那古老的‘政治自我’一重机能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显得空

前的敏感和强化。亡国灭种的瓜分威胁在他们内心激起强烈的忧患意识,并由此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sup>[1]</sup>近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文化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成为影响和参与政治的“政治人”。这双重角色在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可以融为一体的,因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知识分子一方面可以做学问,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舆论影响和参与政治,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在这二者的关系上,张其昀试图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将它们融为一体,用“学术来领导政治”。

张其昀十分重视思想在时代中所起的作用,他将时代比作海湾,而思想犹如要港,要港固然不能离开海湾而独立,但海湾之重要性则全在乎要港之曲折<sup>[2]</sup>。思想如何影响时代,这就需要整个学术界的努力。在内忧外患严重的20世纪30-40年代,张其昀高度强调学者应担负起社会责任,整个学术界亦要有所担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经甲午中日之战,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以迄于长期抗战,一幕一幕的国难,愈演愈烈,目前的国难更属空前。中国的学术界实在无法抛弃本身所负的使命。”<sup>[3]</sup>那么,学术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挽救国难呢?

1932年5月,张其昀在《时代公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提倡召集“士联大会”。所谓“士联大会”,就是“集全国最有智识的人士于一堂,在新党治的原则下,来干名副其实的训政。”<sup>[4]</sup>士联大会成员的资格,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学教授,一种是工程师(此系广义,指一切专门家技术家)。”“教授与技师,博学与专精,好比车之两轮,前者供给深沉的思考,后者供给纯精的法术。前者的缺点是眼高手低,后者的缺点是手高眼低,故两者必须充分合作。”<sup>[4]</sup>在这里,张其昀并不是要求学者专家直接进入政府去从政,而是要群策群力,利用自己的学识、才能,帮助政府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张其昀不仅希望学术界通过“士联大会”去帮助政府,同时也希望学术界通过舆论渠道,成为批评政府的力量。因此,在新闻事业方面,张其昀尤其重视学者的作用,“但要真正负起领导言论的责任,还待学术界群策群力,以整个学术界的资源做后盾,才能善尽言论界的天职。”<sup>[3]</sup>张其昀曾以办一

个周刊为例,认为不仅需要完善的组织,充分的准备,还至少要有二三十位学者,包含各种学科,致心专志,从事斯道,经常搜集中外各国的定期刊物著作以及各种专门学会公私研究机构所作的论文和报告,分析综合,提要钩玄,对于当前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问题,才能“从多种观点,穷其底蕴,然后以深切著明的文章,用社论的体裁,为集中的贡献。”<sup>[3]</sup>在张其昀看来,像周刊这样的新闻组织,以批评时政得失为主旨,应该纯以民间力量为基础。而中国社会中的学者,经历了几十年的国难,持身公正有守有为者不在少数,当国家绝续存亡之际,“他们果能作有力的援助,筹集资金,延揽人才,充实设备,树立起名副其实的权威性的论坛,实在是民主政权的基本条件,也是克服当前难关不可或缺的要图。”<sup>[3]</sup>

深重的国难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们在研究学术的同时,还在思考着怎样用学术来挽救中国颓丧的政局,希望以学术来领导政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这双重角色。因此,在1949年前,张其昀以学者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32年,张其昀进入由钱昌照、翁文灏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为设计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地理教科书的编撰。1939年,张其昀在陈布雷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40年,由蒋介石直接提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在1942年和1945年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和1948年,张其昀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先后参加了“制宪国会”和“行宪国大”。此外,张其昀还被蒋介石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二届中央干事及常务干事,并于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然而,用学术来领导政治毕竟只是学者的理想,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在近代中国,入世与出世之间很难调和,因为近代中国尽管其社会职业结构已经认同于西方,但其社会权力结构却仍然是以官僚政治为轴心的大一统格局,这就造成了知识者双重社会角色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在悖逆:“你欲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么?就最好割弃学问,舍身投入现实政治,谋求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你欲钻研学问,以学术文化造福于人类么?就最好远避政治,以免遭不测之祸。倘若你欲二者兼而有之,那么不仅‘舆论参政’纯属徒劳,于救国无补,而且研究学问本身所必备的那种安宁气氛,也时常会被不期而遇的政治风雨所骚

扰”。<sup>[3]</sup>

这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困境,逼迫着每一位知识者作出非此即彼的痛苦抉择,张其昀也不例外。1949年,国民党输给共产党,被迫退居台湾,这对于信仰三民主义,视共产党为“共匪”的张其昀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他所尊崇的三民主义在大陆已经无法实现,而他本人也无法再在浙大呆下去(竺可桢在1949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记道:“张晓峰来谈渠去就问题,据云王东原来,曾与渠谈,谓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余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重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或一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学术领导政治的理想就更加无从谈起。如果说1949年之前他还能很好的调和入世与出世的关系的话,而现在,他就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了:既然用思想和学术挽救颓丧政局的愿望无法实现,那就干脆弃学从政,帮助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来挽救国民党的颓势。于是,张其昀在1949年后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进入行政中枢,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时期的一名党政要员。

## 二

1949年4月,张其昀离开杭州到广州,并决定去香港创办一所大学,实现自己办学的夙愿,约定同去的还有好友谢幼伟、崔书琴、钱穆等人。但张其昀还未来得及去香港,蒋介石邀其去台湾的电报就到了。他按照蒋的要求,匆匆赶赴台北。钱穆、谢幼伟等人则去了香港,他们按张其昀的嘱托,在香港教育司立案,创立学校,并推钱穆为校长,这个学校就是后来的新亚书院。<sup>[5]</sup>

1949年前张其昀在从事学术教育之外,积极参政议政的原因固然是中国内忧外患所激发的入世情怀,而促使张其昀在1949年放弃自己创办大学的夙愿,选择入世的主要原因则是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意识,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拥护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上。

对于国民党政权,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是复杂的,这更突出的表现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他们既不认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化,也十分痛恨它的腐朽没落,认为它已经“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对它进行激烈地批判;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知识分子们又不得不去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努力帮助它成为社会的重心,并积极加入国民党政府,去对它进行改造,

掀起了20世纪30-40年代专家政治的热潮。而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上与国民党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并不认同其政治上的保守,亦不愿与之伍。

在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上,张其昀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有所不同,他不仅认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化,并且始终至终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张其昀对三民主义推崇备至,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国是。为了证明三民主义的“伟大”,他曾将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进行比较,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看不见思想的重心所在,“在此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个人的自由与民族的自由如果失去了轻重的权衡,将使国家坠入不测的深渊。”<sup>[6]</sup>至于共产主义,则说其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是“独断的片面的洋八股”。<sup>[6]</sup>这种“洋八股”“只是偏见,以未曾学习过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何能真正认识中国,彼既未能知中国,又何能救中国?”相比较之下,只有三民主义“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如果每一个人都信仰三民主义,“则思想重心确定不移,思想自由发展无碍,种种不必要的摩擦可以消弭于无形;不但建国大业得赖以迈进无阻,亦且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从此奠定其基础。”<sup>[6]</sup>张其昀如此看重三民主义,对于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政权自然是要拥护了,不然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呢?

张其昀对国民党政权的拥护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意识的影响。儒家哲学的真谛在乎“中庸”。中庸之道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和谐”,即各种对立的矛盾因素通过“执两用中”得到消解、妥协和折中。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儒家自然就强调安定至上、秩序至上和温和改良主义。在儒家文化传统这一特质的影响下,张其昀一直十分重视统一与秩序的重要性。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造成中国国难的原因就根源于中国的不统一,“中国目前最高之问题,即在求中国真正之统一。”<sup>[7]</sup>统一在谁的领导之下,自然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了,“地方政府必须中央政府之控制,统制之权利应先于自治之权利。”<sup>[8]</sup>

由于对统一的重视,张其昀十分痛恨中国共产党,他十分赞成蒋介石所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山穷水尽之扬子江》一文中,张其昀问道:“御侮、救灾、绥靖三事,孰为首要?”答曰:“绥靖第一,救灾次之,御侮又次之。”张其昀将共产党称之为

“赤匪”。在他眼中,“赤匪”犹如魔鬼一般可怕: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抢夺钱财,破坏生产,还杀人如麻。因此,一定要设法绥靖,否则“其为祸岂特足以颠覆地方政府,实足以摇动全局,为民族存亡所系之大关键。”<sup>[9]</sup>

既然在思想上如此拥护国民党,当陈布雷邀请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没有推辞。1939年,陈布雷站在忠于“党国”的立场上,很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等加入国民党,他的第一批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近的师友。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江河日下,许多知识分子都不愿与之伍,陈布雷邀请的人大部分都拒绝加入国民党,但张其昀欣然接受了陈布雷的邀请,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张其昀加入国民党后,他的学识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二者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1940年,张其昀由蒋介石直接延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与陈的推奖而更得蒋的器重有关。因此张常有来渝的机会,在参政会后必来见布雷,也常受蒋引见。”<sup>[10]</sup>此外,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提到,他在见蒋的时候,蒋都会询问张其昀的情况,对张十分关心,这让张其昀十分感动。

1941年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是由蒋介石拨特费赞助的。竺可桢在日记中曾详细记录刊物所获的财政支持。他在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布雷与晓峰昨在委员长宅晚膳,委员长允拨五万元为办杂志之用,名为《时代与精神》(实为《思想与时代》月刊)。”<sup>[11]</sup>

1943年,张其昀赴美考察,本只有一年,期满后,张其昀有意在海外多做研究,便函陈布雷请代向蒋申请延长时间,当即得蒋准予特拨研究费。<sup>[10]</sup>

1946年,张其昀在报上连载《中国历代之教育家》,蒋介石对此文十分赏识,嘱其出单行本,并亲提封面书名。<sup>[10]</sup>

1949年4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居住在溪口,礼贤下士,召张其昀去溪口面谈3日,询问其对当前国是看法,并商量将范氏天一阁改为公立图书馆。

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张其昀发现,蒋介石在思想上与他有很多契合点:两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即三民主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的认同,都对南京有深厚的感情,主张建都南京(当时不少学者如钱穆、贺昌群等都反对建都南京,而主张建都长安或北平)。在张其昀看来,蒋介石不仅是一位能够实现他所尊崇的三民主义的明君,更是一位知

己,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受中国传统“士为知己者死”观念的影响,张其昀的忠君思想意识逐渐加强,他的人格被分裂成了相互矛盾的两半。一半是主张通过舆论手段来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另一半是忠于蒋介石的依附人格。

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他们在从事学术之外,通过社会舆论成为批评政府的力量,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而后者在“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科举制度、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三张大网的制约下,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即“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sup>[12]</sup>张其昀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他深知他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希望学术界通过舆论渠道,成为批评政府的力量,以参与和影响政治,但他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深。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张其昀还有独立的的人格和意志,对时事政治和国内外形势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眼光,对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不抵抗政策等都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加入国民党后,随着与蒋介石关系的日益亲密,他的独立意识逐渐消失,不仅自己不再批评蒋介石,并且当别人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时,他还会极力为之辩解。到最后,儒家思想意识终于战胜了独立的批判意识,当1949年危难之中的蒋介石向张其昀发出邀请时,张其昀便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办学的夙愿,去帮助蒋介石改造国民党。

纵观张其昀的一生,一直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进行着某种抉择,但他的抉择并不显得很艰难。1949年之前,张其昀重视的是文化价值,他将安身立命之处放在学术和教育上。但内忧外患的国难,激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使他无法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而要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这时,他选择调和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关系,希望以学术和思想去挽救中国颓丧的政局。然而,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无法调和以及张其昀的儒家思想意识使他最终选择了入世,去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帮助蒋介石挽救国民党的颓势。张其昀去台湾后,先后担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中央宣传部部

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长”、“革命实践研究所主任”、“国防研究院主任”,直到1972年11月24日,国防研究院解散,张其昀才谢绝蒋介石要其出任“五院”某院长的邀请,专心致志地经营他已创办10年的华冈学院去了。这一时期的张其昀,虽然弃学从政,成为一名“政治人”,但他在政治领域仍承担着“文化人”的职责。他不仅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上著述颇丰,在教育和文化上也颇有建树,对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及各级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张其昀与大部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样,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浸染。在他身上,既有西方知识分子钻研学问,以学术和文化为人类造福的理想,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因此,张其昀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兼任“政治人”与“文化人”这双重角色,不管他做得是否尽如人意,但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 参考文献:

- [1] 许纪霖. 无穷的困惑[M]. 上海:三联书店,1998:262.
- [2] 张其昀. 时代观念之认识[J]. 思想与时代,1941,8(1).
- [3] 张其昀. 学术与政治[N]. 大公报,1948-11-3.
- [4] 张其昀. 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J]. 时代公论,1932(6).
- [5] 钱穆.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M]. 北京:三联书店,2005:266.
- [6] 张其昀. 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N]. 大公报,1941-03-02.
- [7] 张其昀. 十年来东北问题之演变[N]. 益世报,1940-09-18.
- [8] 张其昀. 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制度[J]. 思想与时代,1941(2).
- [9] 张其昀. 山穷水尽之扬子江[J]. 时代公论,1932(5).
- [10] 陈训慈. 先兄畏垒杂忆[M]//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4-15.
- [11]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6.
- [12] 许纪霖. 许纪霖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3.

责任编辑:骆晓会